

○奧烏報反沈於六反處昌慮反下同棖宜衡反闌食饗

不為槩

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食音嗣。饗本又作享香兩反槩古愛反饌士戀反

祭

祀不為尸

尊者之處為其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為其音于僞反下注除不為孤皆同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

不登高不臨

深不苟些言不苟笑

為其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訾

音也沈又

疏

為人至苟笑。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居處及行立待賓祭祀敬慎之事各隨

此明孝子居處闔門之內不言凡者或異居禮則

居不主與者主猶坐也與者室內西南隅也室嚮南

西南隅隱奧無事故呼其名為奧常推尊者

處故尊者居必主奧也既是尊者所居則人

阮刻禮記注疏

(清)阮元校刻



四部要籍選刊

蔣鵬翔 主編

阮刻禮記注疏

一

(清) 阮元 校刻

浙江大學出版社

傳古樓據上海圖書館
館藏清嘉慶刻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一七二毫
米寬一二三毫米

阮刻禮記注疏出版說明

嶽麓書院 蔣鵬翔

《附釋音禮記注疏》六十三卷，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領銜）疏，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屬阮刻《十三經注疏》之一。「一」

—

《漢書·儒林傳》云：『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二」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三」

—

《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四〕

《隋書·經籍志》云：『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五〕

《禮記正義》云：『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六〕

關於《禮記》的來歷，一直聚訟紛紜，我們讀洪業先生的《禮記引得序》〔七〕，便可知此問題的疑竇之多、爭論之劇，但無論學者持何種態度，都不得不承認上述幾段引文，是討論《禮

記》由來的最重要的基礎文獻，那麼在尚無定論的今天，保留傳統的觀點，認為禮學之興，始於西漢高堂生傳授的十七篇《士禮》（即《儀禮》），然後數傳至后倉，后倉傳戴聖，戴聖又纂輯當時所見的論說禮學的文獻而成《小戴記》，東漢時鄭玄注之，遂成今日之《禮記》，應該是較為穩妥的。

關於《禮記》的性質，也是見仁見智，我們認為在這一問題上，呂思勉先生的觀點比較通達可取。

今之《禮記》，究為何種書籍，習熟焉則不察，細思即極可疑。孔子刪定之籍，稱之曰經，後學釋經之書，謂之為傳，此乃儒家通稱。其自著書而不關於經者，則可入諸儒家諸子，從未聞有稱為記者……《記》蓋社會故有之書，既非孔子所修之經，亦非弟子釋經之傳也。此項古籍，在孔門傳經，固非必備，而亦足為參考之資……然則所謂《禮記》者，其初蓋禮家哀集經傳以外之書之稱，其後則凡諸經之傳，及儒家諸子，為禮家所采者，亦遂概以附之，而舉蒙『記』之名矣。「八」

《禮記》所言，多切近日常，文辭優美，意蘊生動，既不似《儀禮》之精密繁冗，又非《周禮》

廣大嚴肅之倫，故在三禮之中，最爲人所樂道。王文錦先生稱：『幾千年來，對中華民族意識形態影響最大的書是儒家的書。從所起作用的大小來估計，《禮記》僅次於《論語》，比肩於《孟子》，而遠遠超過《荀子》。』〔九〕這一評價是很得體的。

二

既知《禮記》之重要，亦應知其書之難讀。

《禮記》者，漢儒爲《儀禮》之書，好古者務徵采，多存古義，網羅放失，不爲區別，或不盡合乎《儀禮》之經，其文奧而儀繁與《儀禮》若，而名物制度之瑣碎紛若而不一，其難窮則已過之。至其摭拾綴緝，既非一本，文異而義乖者，百慮殊塗，錯出間見，雖有鄭、孔之學之精，而徇文以汨經，執予以攻盾者往往不免。後人發明之者，視《儀禮》尤少，蓋舍經以治記，塞本源，亂家法，則《禮記》之難讀甚於《儀禮》遠矣。〔十〕

我們要讀懂《禮記》，首先要倚仗的即漢之鄭玄注，唐之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關於此三者的價值，黃侃先生曾做過精闢的評價。

鄭玄注：

《禮記》雖有馬融、盧植（注），今皆不傳。《禮記》釋文及疏云：鄭亦並依盧、馬之本而爲注，然後之言小戴者，皆傳鄭氏。鄭又考正禮圖，存古遺制，是三禮之學，萃于北海。故《大戴記》，鄭所未注，則若存若亡，八十五篇遂殘其半矣。由晉及唐，諸經所主，或有不同，至於《詩》共宗毛，《禮》同遵鄭，即王肅、李譔之倫，有心異鄭，學終未昌，此必有由來矣。

此可知鄭君之雅達廣攬，博綜眾長矣。雖良玉有瑕，終爲良玉。後人或攻癥索瘡，抑補闕拾遺，終不礙其爲絕學也。若夫質于辭訓，通人頗譏其繁，然觀《鄭志》答張逸云：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眾篇皆然。是知注文本簡，有時不得不繁，豈秦近君說《堯典》篇目二字，至十餘萬言之比哉。

陸德明音義：

陸氏《釋文》成于陳世，所載異本、異讀略備，六朝故誼賴此見其梗概，與後來顏師古定本、孔賈二疏、開成石經多有不同。讀三禮者，先辨音義，則此書其管籥也。

孔穎達疏：

自晉、宋逮于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范宣等，皇氏（皇侃《禮記義疏》）特其一耳。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唐初，孔穎達等奉敕修《正義》，時行世者，惟皇、熊二家，故據皇爲本而補之以熊。孔疏雖依傍皇疏，然亦時用彈正，采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故清世諸經悉有新疏，獨《禮記》闕如者，亦以襄駕其上之難也。〔十一〕

簡單地說，《禮記》待鄭玄注後才得到普遍的關注，使其在指不勝屈的同類著作〔十二〕中佔據最核心的位置，甚至超過了本爲正經的《儀禮》，孔疏則不僅集前朝義疏之大成，且壓倒後世學者，即使到了樸學極盛的清代，也再未出現差可雁行的新疏〔十三〕，這在經學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的成就，也是所有研習《禮記》的學者必須精讀鄭注孔疏的原因。

三

南宋紹熙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禮記正義》七十卷，半葉八行，世稱八行本，是爲《禮記》經注疏合刻之始，但未附音義，故後來福建地區又出現了一種在經文各句後附上陸德明音義的

新版本，名爲《附釋音禮記注疏》，半葉十行，世稱十行本。之後《禮記注疏》的元翻刻十行本、明正德補刻十行本、明嘉靖李元陽刻本、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本、明末汲古閣刻本皆源於此宋刻十行本。「十四」

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以江西巡撫阮元家藏十行本爲底本，重刻《禮記注疏》，當時號稱『重刊宋本』，然據學界研究，該十行本與阮刻《十三經注疏》的其他底本一樣，仍是元代翻刻本，並非宋槧原書。校勘能夠利用何種版本，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今人可見者，古人未必可見，如《毛詩》的宋刻十行本，孤懸海外，少人知曉，則嘉慶時重刊《毛詩注疏》，只能用元代翻刻本做底本，當然無可厚非。近來，學界卻有藉以輕詆古人者，如筆者嘗見一文，歷數阮刻《禮記注疏》校勘時引用衛湜《禮記集說》的種種過失，而歸咎於其僅據清通志堂刻本立論，未能參考年代更早、文本更佳的宋刻郡齋本，并直斥爲『根本性的錯誤』，如此刻舟求劍的邏輯真是讓人深感無奈，也希望研讀古典文獻的同仁們能夠遠離這種奇怪的優越感。

但阮刻《禮記注疏》在版本校勘方面確實留有遺憾。其《校勘記序》云：『《禮記》七十卷之本，出於吳中吳泰來家，乾隆間惠棟用以校汲古閣本……今《記》中所云惠棟校宋本者是也。其真

本今藏曲阜孔氏。近年有巧偽之書賈取六十三卷舊刻添注涂改，綴以惠棟跋語，鬻於人，鏤板京師者，乃鴈本耳。』這裡所說的『鴈本』，即清乾隆六十年和珅影刻十行本《附釋音禮記注疏》。

和珅本序文後有牌記曰『建安劉叔剛宅鋟梓』，與日本足利學校遺跡圖書館藏宋刻十行本《附釋音毛詩注疏》《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同出一手（《毛詩》有『劉氏文府』『叔剛』的牌記，《左傳》有『建安劉叔剛父鋟梓』的牌記）。核其字體、行款及版式特點，亦與宋刻《毛詩》《左傳》若合符節，可知其影刻的底本當係真正的宋刻十行本，非阮刻依據的元代翻刻本可比。如阮刻卷一第二葉前半葉第一行『封禪云』，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十行本同，而和珅本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八行本皆作『封禪書』；阮刻同葉後半葉第九行『郁郁乎文故』，元刻明修十行本、和珅本、八行本皆作『郁郁乎文哉』〔十五〕；阮刻同卷第四葉前半葉第三行『下家之儒』，元刻明修十行本同，而和珅本與八行本皆作『五家之儒』。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與元代翻刻本相比，和珅本不僅更忠實地保留了宋刻十行本的面貌，在文本上也較接近於注疏合刻的祖本——八行本。如果能夠在校勘過程中認真利用和珅影刻本，而不是因其『鴈本』之名即棄如敝屣，阮刻《禮記注疏》的文本質量應該是可以更上層樓的。尤其考慮到這是當時校

勘者與真正的宋刻十行本正經注疏最接近的一次機會「十六」，最終卻惑於耳食，輕易錯過，實在令人感到格外的惋惜。

四

材料方面的缺憾並不能抹殺全書的成績。自問世迄今，阮刻《禮記注疏》始終是業界的通行版本，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甚至是大眾唯一能夠利用的本子。這種情況直到近年才逐漸發生變化：一方面得益于數據傳播手段的進步，普通讀者也可以方便地看到《禮記注疏》各種早期版本的影印本或數字化書影；另一方面隨著古文獻研究力量的增強，不僅批評阮刻缺點的論文在不斷增加，風格各異的《禮記注疏》標點整理本也在陸續出版。於是有讀者可能提出質疑：如果要看古本面貌，現在已經有了宋刻八行本和元刻明修十行本的影印本，讀書以溯源為上，讀這些書豈不是比讀阮刻更合乎規矩？如果是想看較為清晰可靠的經書文本，他社也已刊行基於宋本、影刻宋本整理的標點本，自應比阮刻更便閱讀。那麼今天繼續影印阮刻的意義何在？答案很簡單，對前一類讀者來說，宋刻未必是，清刻未必非，文獻學的世界里不存在絕對

正確的客體，即使是宋刻八行本或單疏本，也不能取代阮刻；後一類讀者則應該認識到阮刻在廣義上同樣屬於整理本的範疇，儘管受到時代條件的限制，校勘版本或有缺憾，但其總結了歷代刊印注疏的經驗，匯集了清人校理甲部的心得，同時主事者又兼具虔誠的心態與深厚的學養，故最終造就的阮刻《禮記注疏》確實是一部整理得非常嚴謹精緻的經書，即使取與被譽為『當今最佳整理本』「十七」的呂友仁先生點校本「十八」相比，也並無愧色。下面各舉幾個例子。

宋本誤而阮刻不誤者：

(一) 阮刻卷一第十三葉前半葉，經云『則志不懾』，注云『懾，猶怯惑』，疏云『注「懾，猶怯惑」……』。宋刻八行本疏文之『懾』訛為『攝』。

(二) 阮刻卷一第十八葉前半葉，經云『冬溫而夏清』，宋刻八行本不附音義，宋元遞修本《經典釋文》此條云『清，七性反，字從丶，水冷也。本或水旁作，非也』。其中有兩處問題，首先『字從丶，水冷也』應作『字從丶，冰冷也』，其次『本或水旁作』應作『本或作水旁』。清通志堂刻《經典釋文》已將『水冷』改為『冰冷』，而仍存『本或水旁作』之誤，阮刻此句釋文則兩處皆已改正。

(三)阮刻卷二第二十葉後半葉，疏云『不得用醕故鄭注彼云設而不舉』，宋刻八行本脫『鄭』字，又『云』訛爲『去』。

(四)阮刻卷三第四葉前半葉，經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注云『與，或爲予』，疏云『言與或爲予者，謂諸本禮記有作予字者，故云與或爲予』，宋刻八行本疏文訛爲『言與或爲子者』。

呂友仁本整理不及阮刻用心者：

(一)阮刻卷一第八葉後半葉，注云『晉士句帥師侵齊』，音義云『丐，本亦作句，音蓋』。呂友仁本係拼合影刻宋八行本之經注疏與宋元遞修本《經典釋文》之音義而成，此句注文、音義與阮刻同。但顯然陸德明所見之本作『丐』，與注文所據之本作『句』不合，故阮刻出校記云『晉士句，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土丐，云本亦作句，正義本亦作句，是也，丐別爲一字。』呂本此處無校記。

(二)阮刻卷一第二十二葉前半葉，經云『食饗不爲槩』，注云『槩，量也』，音義云『槩，古愛反，量也』。此處注文與音義重複，既然合爲一書，自應刪去一處『量也』。阮刻即刪去音義之『量也』，呂本未刪。

(三) 阮刻卷二第七葉前半葉，注云『《弟子職》曰：執箕膺搗，厥中有帚』，音義云『膺，於陵反。葉，如字，箕舌。』按注文之『搗』即音義之『葉』，二字不相應，故阮刻出校云『執箕膺搗，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搗作葉，《考文》引古本亦作葉，山井鼎云古本作葉，《管子》作搗，而今此注作搗者，蓋涉《少儀》篇誤耳，當以古本及《釋文》爲證也。案山井鼎說非也，《正義》本自作搗，故疏中皆作搗字。○按段玉裁云，凡柶之盛物箕之底皆謂之葉，或作楨，譌作搗，葉亦謂之櫬，《少儀》作搗，乃櫬之誤，古音齏聲葛聲相近，故從齏字，或多作葛也。』呂本此處無校記。

或有人提出，整理古文獻，以忠實底本面貌爲上，但呂本並不是完全不改正文，如其第三十一頁，經云『三賜不及車馬』，注云『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疏云『注三賜至於君。云三賜三命者，受命即受賜』。此句疏文宋刻八行本原作『云三賜不及者』，呂本出校曰『云三賜三命者，三命原作不及，據考文引宋板改，必如宋板方與注合』。則其當出校記而未出，當改正文字而未改者，十之七八確係呂本整理的疏失，自不必曲爲之說，爲賢者諱了。

五

無論是重刊還是排印，其實質都是對底本原貌的破壞（當然，排印本破壞得更為徹底）。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底本原貌的破壞也意味着校刊者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原書形式的桎梏，可以相對自由地改正內容，使其文本質量在底本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重刊過程中固然不免出現新的錯誤，阮刻《禮記注疏》亦是如此，但如果因為擔心出錯，就不敢或不願表達自己的異見，則舊籍重刊的意義何在，恐怕主事者也難以自圓其說，『大抵刻書妄改者陋，不改而藏拙者亦陋也』〔十九〕。

我們此次影印阮刻《禮記注疏》的底本得自上海圖書館，其與中華書局二〇〇九年影印的阮刻本雖同屬清嘉慶刻本，文字卻多有變化。如卷十三第八葉後半葉第一行，中華本作『制，七智反』，上圖本作『刺，七智反』；卷十四校勘記第十葉後半葉第一行，中華本作『故耕月亥』，上圖本作『故耕用亥』；卷二十二第十一葉前半葉第一行，中華本作『生之效也』，上圖本作『性之效也』；卷二十五第四葉前半葉第一行，中華本作『三獻也』，上圖本作『二獻也』；

卷二十九第十四葉前半葉第一行，中華本作『在鄉之旁』，上圖本作『其鄉之旁』；卷三十九第二十一葉前半葉第一行，中華本作『比毗惑反』，上圖本作『比毗志反』；卷四十一第二十二葉後半葉第一行，中華本作『三十年』，上圖本作『昭三十年』；卷四十五第二十二葉前半葉第一行，中華本作『三畫爲黻三畫爲雲』，上圖本作『二畫爲黻二畫爲雲』；卷五十八第八葉前半葉第一行，中華本作『非爲餘衽悉當旁也』，上圖本作『非爲餘衽悉當旁也』；卷六十三葉後半葉第一行，中華本作『真知』，上圖本作『莫知』；卷六十三校勘記第二葉後半葉第一行，中華本作『言此禮可貴與玉相似』，閩、監本作「此」，毛本作「其」，此本空闕，上圖本作『以圭璋聘節』。核其文字，皆以上圖本爲優。總而言之，重刊本出現錯誤無可厚非，這是在校正底本文本的过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只要重刊本的文本質量整體上有所提升，包含有價值的新解，這種代價就是值得的，至於重刊本中所發現的問題，完全可以在後續的出版工作中加以改正。這也印證了筆者在《阮刻春秋左傳注疏》出版說明中提出的觀點：清嘉慶阮刻《十三經注疏》內部同樣存在初印本與校定本之分。此次影印的上圖藏本屬於校定本的範疇，對於有志研習經典的讀者來說，這個影印本無疑是值得鄭重考慮的選擇之一。